

人倫之情、尊卑之序：

由漢文劍客小說中「君臣」、「父子」

論日治臺灣忠孝觀的建立

林 以 衡^{*}

摘 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被轉刊到臺灣漢文報紙上的日本劍客小說為研究起點，藉由對小說內容與人物關係的梳理，思考「忠孝」如何作為君臣、父子倫常關係的行為準則外，並以這幾篇劍客小說為例，延伸論述日治臺灣由「忠優於孝」到「忠孝一本」觀念的確立。

首先，透過文本的細讀，本文分析這些小說中所書寫的君臣、父子間「忠」、「孝」的情節，探討在這個人倫之情與尊卑之序中，其間的忠、孝觀如何被建立，以及在小說中所呈現「忠優於孝」的觀念。

其次，本文擴及探討的視角，論述為何整個日治臺灣忠孝觀，並非以漢文劍客小說中「忠優於孝」的觀念貫穿整個日治時期，而是以「忠孝一本」作為殖民地臺灣主要的忠孝觀。最後，透過上述研析，

^{*} 作者現為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本文期待能對殖民地臺灣忠孝觀的建立有更深入理解外，並能以此研究成果，作為未來日治臺灣觀念史建構的基礎研究。

關鍵詞：忠孝、劍客、君臣、父子、五倫

The Affection in the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Order of Social Hierarchy:

A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Principle
in the Chinese Swordsman Novel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Yi-heng Li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ntex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the Chinese swordsman novels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and published on Taiwanese newspap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as used as the main principle to deal with monarch/courtier and father/son relationships.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 of “loyalty is greater than filial piety” to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s a whole” in these novel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It is indicated that, instead of the principle of “loyalty is greater than filial piety,” the principle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s a whole” was the mainstream idea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on Taiwan. Therefore, the context behind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hope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dea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Keywords: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swordsman, monarch/courtier, father/son,
the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人倫之情、尊卑之序：

由漢文劍客小說中「君臣」、「父子」 論日治臺灣忠孝觀的建立^{*}

林 以 衡

一、前言

日治初期的臺灣，除了要面對世變交替的政治變化外，現代性／傳統性在殖民力量進入臺灣後的拉扯，更是長久以來為學界所關注的議題。但在這股新／舊勢力的拉扯過程中，不只是意識形態、國族認知或社會秩序的轉變，新／舊觀念的嬗變與疊合、調合與激盪，同樣成為日治臺灣研究值得深究的議題。

乙未割臺後，取代清廷成為臺灣新統治者的日本，除了在政治、法治和教育上逐步展開統治的布局外，也透過報刊上文學作品的刊登，試圖將其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等，帶入甫被統治的臺灣。例如知名漢學家如菊池三溪（1819-1891）、依田學海（1834-

* 拙文為本人執行科技部計畫：「由傳統到現代——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倫理觀的新舊交替與公私衝突」（MOST 105-2410-H-431-019）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日本京都女子大學中國語教室、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合辦：「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6月3-4日）。拙文經長時間修改後，又於審查時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珍貴的修改意見，使全文能更趨完善，論者亦受益良多，於此致謝。

1909)、¹稻岡奴之助(1873-?)，或是以講談聞名者如松林伯痴(松林伯知，1856-1932)等人的創作，都是在當時的報紙上常見的連載小說。這些文人所創作的漢文小說題材多元，其中以描寫日本武士行徑為主的「劍客小說」，²在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等各類主題中獨樹一幟，成為探討日本殖民者精神、觀念如何藉由小說刊登被引介、傳播進入臺灣文化場域的重要分析對象。³而小說中被作者描述，智勇雙全、忠孝兼具、有仇必報的劍客們，其作為殖民者所塑造的典範，他們的思想、行為在殖民地臺灣的被接受，將帶給臺人另一種殖民文化的體驗。

人物是小說中的靈魂，因為有人物的塑造，情節得以展開、對話於此生成。透過對話或是對事件的思考，作者寓意或是時代思潮將展現在小說的人際往來中，所以人物交流與倫常之情是解析小說時可探討的問題。⁴欲探討人物關係，就必須要由倫理規範的探究出發，才能由對人物思維的釐清中，了解小說背後所生成的文化意涵。⁵這正是現今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研究所缺少的研究視角，有待研究者深入爬

¹ 可參考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3年）、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頁149-185。

² 本文所指稱的「劍客」，大多數含有「武士」身分，但也有例外如〈兄弟復父讐〉的兩兄弟，就不具備武士身分。參考前人論述，「武士小說」並非對此類小說通行的稱呼，而多是以「劍客」指稱小說中的人物為多，故本文以「劍客小說」稱之，但不可否認他們多數擁有「武士道」特質。小說名稱定名可參考森川哲郎：《室町——明治劍豪列傳·日本劍豪·名勝負100》（東京：日本文藝社，1980年），頁131。以及茂呂美耶：《物語日本：劍客生活忍者昔人歲時》（臺北：遠流，2002年）。

³ 關於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特點，可參考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19年）。

⁴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頁67。

⁵ 所謂「倫理」，指的是人群相對相倚的生活關係與法則。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編：《中華百科全書》第6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2年），頁81-82。

梳。⁶但要思考小說人物的倫常之情，就必須由對「五倫」的探究著手，才能逐步建構起小說人物網絡的寓意。⁷這五者之間，各有其權力互動、人性情感值得深究，但又以「君臣」和「父子」可作為探討小說人物關係的入門。因為「君臣」和「父子」在以皇權和父權為主的傳統社會裡，具有領導性和延展性的作用，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軸的文化體制所最先強調的兩者。⁸而殖民地則兼具了殖民者統治時的專制性，以及中、日統治者所帶來的傳統性。故本文在探討殖民地臺灣通俗小說如何受到日本殖民者意識形態的影響時，由傳統五倫中的二倫「君臣」、「父子」出發，最能了解日治初期世變下的臺灣，此傳統人倫之情、尊卑之序，是否因時代推移，而有所變異？而對此二倫進行探究後，本文將更進一步思考，伴隨此二倫所衍生出的「忠孝」觀，⁹如何在殖民地臺灣，透過此二倫的互涉，而在殖民地臺灣

⁶ 以往對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多偏重於主題式的研究，較少探討小說中思想性的問題。例如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年），頁237-283；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王俐茹：《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等。

⁷ 「五倫」觀念，在孔子時並不完備，一直到了孟子，才提出明確的「五倫」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說：「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8·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98。

⁸ 例如孔子最先說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重要性。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8·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108。根據《禮記·禮運》中所闡釋的「十義」，即有解釋「君臣」、「父子」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關係。」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5·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431。

⁹ 藤田東湖在〈忠孝一本論〉中即言：「人道無比五倫為急者。五倫無比君父為重者。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也。」可見「君臣」、「父子」在五倫關係中的重要，以及所引發出的「忠孝」問題，亦有探討的價值。藤田東湖：〈忠孝一本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1年5月11日。

建立起它的意義，對於殖民地臺灣，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透過上述問題的梳理，本文將能結合「君臣」、「父子」和「忠孝」等觀念的思考，推究這些觀念在殖民地臺灣交互影響下的意義，未來甚至能將此觀念的探究，擴大到對近世東亞範疇加以思考，而能研析東亞人倫之情、尊卑之序，如何由殖民地臺灣的視角出發，形構出不同角度的思考。

回顧過往，上述議題已在不少研究中被注意，成為本文值得參考的研究對象。例如黃美娥論及日本漢文小說於殖民地臺灣可繼續探討的重要性，針對日本漢文小說在臺灣被用於國體建構的意義；¹⁰柯混瀚、林以衡則分別探討這些漢文小說的漢學淵源，或是其被臺灣文人學習的意義，但對於其中觀念承衍的探討，都有待研究者補足。¹¹而對「忠孝」觀最完整的討論，則為佐藤將之與張崑將二人。佐藤將之對於中國先秦典籍中的「忠」觀念有深入的闡析；¹²張崑將則長期關注中、日兩國對於「忠孝」觀念的歧義性，推衍出中、日兩國「忠優於孝」與「忠孝一本」的異同。¹³透過佐藤氏與張氏的研究，引發吾人更為深思的是，作為中、日兩方政治、文化勢力交織下的臺灣，其

¹⁰ 例如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63-396。

¹¹ 其他如薛建蓉針對通俗歷史小說的探討，或是林以衡針對武士道精神的研究，或是柯混瀚以文言小說為例，討論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的漢學淵源，都是近期以漢文通俗小說為主的前行研究。分見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林以衡：〈跨界的和魂：《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通俗小說對「武士道」的引介與再現〉，《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271-308；柯混瀚：《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源——以文言小說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4年）。

¹²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¹³ 張崑將的研究，將日本國內「忠孝」觀的嬗變、爭論與歷史脈絡論述的極為清楚，不少論點可供本文借鏡於對日治臺灣「忠孝」觀的探討。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2-5。

「忠孝」觀在殖民地臺灣如何藉由「君臣」、「父子」的人倫關係而形成，將是可深究的議題。因此，本文將透過對上述幾個傳統觀念於日治臺灣漢文小說中的研析，除探討其於殖民地語境下的意義外，亦將勾勒出這些觀念在日治初期殖民地臺灣的因果關聯。故本文將以觀念史研究法為主，¹⁴並以小說文本的細讀與分析為基礎，先分論「父子」／「孝」、「君臣」／「忠」於臺灣漢文劍客小說的意義，最後，思考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忠孝觀的合流，並探究其共生意義。此問題既是中、日傳統觀念在日治世變之際的探索，亦是建構日治時期臺灣各觀念形成的探討。畢竟，對於世變之際的臺灣而言，如何將殖民者移植來的觀念與固有的觀念相結合，其間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對話和火花，各個都會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二、孝父：歷險動機與生死抉擇

「孝」作為人倫的基本要件，不但是人人都需具備的德性，更是身為一名劍客，所必須實踐的操行，才能突顯出身為主角的劍客，比常人有更高的道德意識，而能為世人所肯定。而「孝」也在東亞傳統中，發展出與西方迥異的價值，成為研究者在論及中西倫理的異同時，最常被討論的觀念。由東亞視角觀之，在過去的中國或是日本，無論是皇帝、主公、天皇或是幕府將軍，所表現出的皆是集權的君主制度，在此制度下的劍客或武士養成，就必須要以「孝」為基本人格，通過一連串的試煉後，最終進階為主君所賞識的「忠臣」。故在

¹⁴ 誠如金觀濤、劉青峰所言：「觀念比思想更具有明確的價值〈行動〉方向，它和社會行動的關係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很多社會行動如革命、改良、立憲、啟蒙，可以視為在某一個或幾個觀念指導下產生的。或者說，在社會行動中，觀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動者想像〈在心裡預演或計畫〉或事後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觀念可以視為社會行動的組成部分。」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政治重要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4。

論述「忠孝」觀念的形成時，就必須先行探討小說如何描述這些劍客的「孝」，以作為思考父子之情如何演變為君臣之序的起點。¹⁵

小說〈塚原左門〉描寫主角塚原左門成為一代劍客之前，僅是家中一位等待繼承家業的人子。但在某次的武道比試中，塚原左門先是代父出征比武，取得勝利；後又因其父塚原源內所開設的武館頗有名聲，招致反派人物川北大學的嫉妒，兩方因此結仇。塚原左門的品德與武藝雖受主君肯定，但為避禍，塚原左門不得不依父命踏上行旅之途，開啟其冒險的過程：

源內復告知曰：「汝其遍歷日本六十餘州，與天下之武術者比較鍛鍊，至五年、七年然後歸，如是，則大學之恨銷矣。汝今宵備行裝，明曉起程，勿遲也。」左門清則流淚交頤，不敢逆父志，惟叩首曰：『兒不肖，不能計前慮後，致貽大人憂慮。兒出門，雙大人之玉體祈為加賽。』」¹⁶

塚原左門的「孝」表現在為父爭取名譽，才因此與仇敵結怨；同時，身為人子，雖然心有不甘，但不敢違背父命而展開冒險旅程，可見塚原左門遵循「孝」的基本原則，而處處以父命作為行事準則。而對「孝」的恪守，也成為貫穿整篇小說的主軸。只要是與主角塚原左門同為正派人士的角色，大抵皆以「孝」作為出場的形象。例如作為塚原左門的師弟，藤兵衛在父親受冤被陷後，臥病在床。身為人子，除親奉湯藥照料外，更以為父洗冤為第一要務：

却說藤右衛門自淨業寺歸來，身體十分不快。是夜即惡寒發

¹⁵ 試煉之路（The road of trials）一詞，出自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之語，坎伯分析許多神話，指出其共相乃在於英雄的形成，必先經過一連串的考驗，經過許多「困難任務」的洗禮後，才足以成就英雄角色的誕生。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縣：立緒文化，1990年），頁100。

¹⁶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1月28日。此小說漢文部分為「講」、日文部分為「講演」。

熱，藤兵衛急為延醫調治、廢寢忘餐，晝夜服侍不倦。奈何老人病體若風中燭然，□（按：原件不清，以□標示，以下同）就蒸篤、奄奄一息。……藤兵衛左執了禪和尚而古牽松花樓妓女以入，為述了禪竊金事故及誣其父一一。締真長老大怒，笞以禪杖數十，放逐出山，藤右衛門之冤始明。……藤兵衛乃就備前岡山塚原源內學劍術。¹⁷

而之後塚原源內為小人所害、塚原家家破人亡，除塚原左門以為父報仇為最終的盡孝手段外，藤兵衛亦遵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原則，加入為師父報仇的行列中。無論是「父親」或是「師父」，兩人對「孝」的徹底實踐，以及對父子倫理的遵守，成為貫穿整篇小說的骨幹。

同為日治初期的長篇劍客小說〈寶藏院名鎗〉，小說中的「重瞳子」清七，深知父親是為繼母美吉與其外遇對象所害，除以報仇作為盡孝的方法外，所欲報仇的對象卻非針對繼母，而是以外遇者為主要標的。¹⁸可見繼母美吉雖不脫兇手罪責，清七雖有因父仇而生的恨意，但仍須考量到其為「子」的地位，不能違背「孝」的界線，故明知美吉有心致其死地，仍不得不接受吩咐、至水漲的河邊補魚以孝敬母親：

時值夏雨淋漓，近川水漲，孤燈慘淡之下，美吉兩眉間隱隱有殺氣。呼重瞳子至，曰：「余今渴思鯉魚，若其往過溪買一

¹⁷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2月20日。

¹⁸ 〈寶藏院名鎗〉對清七以「重瞳子」的特徵加以敘寫，與中國傳統至孝代表「舜」的紀載有明顯的關聯，而「舜」又為儒家傳統大孝之君王。若對照《孟子·盡心》，也對「舜」在「孝」與「天下」的取捨有深入討論。綜合上述，未來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此參考。

頭，」重瞳子唯唯，即命執燈往。重瞳子不敢辭，執燈出，思：「阿母將以是殺余。」¹⁹

明知繼母意圖害死自己，仍決定遵從母命前去犧牲自我。以現代的觀點視之，這種「愚孝」態度，在當時的氛圍中襯托出劍客欲成就大事業前，必先遭到各種苦難的歷練，而對「孝」的堅持，不因長輩存有不良居心有所減損，「孝」成為劍客所必須固執遵循的信念。還有如〈塚原卜傳〉中的塚原卜傳，已經身任伊勢守的家臣，且深受主君重用，但父病急返仍是其身為人子所必須盡的「孝」，這不但是基本人格的信條，更是因為唯有盡孝，才不愧於劍客之名：

卜傳天資絕頂，聞一知十。十八歲時，劍道之精，直凌駕厥師而上。一日，與師傅上泉伊勢守閒談，塚原城之家人齋書至，披而視之，父病甚篤，卜傳驚而乞歸，望鄉關之迢遞，歎阿父之綦危，父子天性，而卜傳又係至孝，此時卜傳直恨不能如長房之縮地也。然而卜傳歸矣，上泉伊勢守之武術館忽有事焉。²⁰

不過，也並非各個劍客的「孝」都是按照「父子」倫常的和諧關係而進行。小說要引人入勝，就必須要製造事件的開端、衝突，以形成情節的高潮，部分劍客小說其開端往往即是以父子衝突為起始，但卻因此更突顯身為人子的主角，其對盡「孝」的恪守心態。

〈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刻畫了這個對「孝」的矛盾。菅谷半之丞原來在家中地位穩固、儼然將繼承家督之位。但父親半兵衛中年喪偶後，續弦的後妻絹子年紀與半之丞相近，不甘寂寞之餘，絹子屢屢對半之丞示好，帶給半之丞極大困擾：

¹⁹ 雲：〈寶藏院名鑑（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6月16日。

²⁰ 雲：〈塚原卜傳（一）〉，《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2年1月7日。

絹子掩袖笑曰：「子縱不為黑白計，其肯不為婦人計乎？聞子美貌，閨閣中婦女為女害殺者不知其幾人？子朝遊鶯夕之宮，暮宿燕夕之宅，又何暇如汝老子偷閒作無聊之想乎？」半之丞聞言，惶恐戰慄，汗流浹背，意謂絹子雖年齡與己若姐妹，實則彼母也，半之丞子也，今彼來戲余，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豈容此無父無君之行為？況余亦曾身沾孔孟教誨，沐武士道栽培，其肯作此背倫背德之事？²¹

雖無血緣關係，但絹子已是父親續弦之妻，在倫常上為半之丞的長輩，若有輕浮越線的舉動，自是不被容許的亂倫行為。不過，被拒絕的絹子在惱羞成怒下，兼之有意與半兵衛之友須藤數馬私通，開始在半兵衛前搬弄是非，製造父子衝突以陷害半之丞：

絹子歎曰：「妾恨不皇天促余壽，增子壽算，妾在，非所以福子家也。妾今亦不得不一言，但祈勿怒，妾當競戰自持，斷不敢辱亂汝家。」遂將平生幾許腹捏造事實，向良人吞吐，謂之丞乘父不在，如何戲妾，妾如何婉拒，道畢又哭，哭畢又道。半兵衛一面勸勉，一面憤怒，立命家人，四處往尋之丞回家。²²

於是菅谷半之丞開始受到父親的責難，在以孝為本的觀念下，為全「父子」倫常，險些含冤自殺，以維護名聲與孝道：

之丞仰見阿父怒髮欲指，雷聲呼喝曰：「滅倫不肖子，余不意汝竟人頭而畜鳴也。」半之丞恐懼，縮作一團，連叩頭問：「阿父何怒？」半兵衛披髮跳叫，目眦欲裂，揮鐵拳飽之丞，

²¹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1910年5月29日。

²²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0日。

恨恨作聲曰：「世間惟菜公面為賊心。畜生背倫，無父無母，不肖之徒，皇天不覆汝，后土不載汝，鬼神不容汝，嗚呼噫嘻！汝真人頭而畜鳴。」……歎曰：「嗚呼！……繼母唆父誣兒獸行，怒撻欲死。嗚呼！欲辯則傷父心、辱繼母，且阿父亦未必肯信……『畜生背倫，無父無母』之言，父詈兒，兒則不堪，阿母有知，必能明證，吾將隨阿母於地下，無面父復見阿父，乞地下神祇，庇阿父、繼母改心，生肖子光嗣續，嗚呼哀哉！」²³

菅谷半之丞對被冤之事百口莫辯，只能在以「孝」的前提下，試圖以自我犧牲作為洗刷冤屈的可能，並以生命成就「父子」關係的穩固。

由上述各篇小說觀之，「孝」不但是作為日本劍客立身處事的起點、人格品性的基礎，在日治初期蔚為轉刊風潮的劍客小說中，更成為情節共通的基本架構。劍客小說往往由劍客對其父的「孝」展開其冒險、試煉的歷程，而「孝」這個基本的德性，也在父子倫理間的和諧／衝突中，扮演一個堅定的信仰中心。無論小說中的父親再怎麼昏聩，身為孝子的劍客，寧願用生命去換取對孝的實踐、對父子倫理的維護，可見「孝」雖是人人皆有的特質，但劍客卻必須更盡心地去表達它。而由「孝」出發，在不少小說中更將拓展其意義，而將其延伸至「忠」的發揮，進而將父子之倫，擴充到對君臣之倫的達成。

三、忠君：父子衝突的消解與親情延伸

長久以來，「忠」與「孝」一直是共生關係，例如：「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的觀念，是最常見的說法。²⁴而成為維繫五倫中「父

²³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1910年6月12日。

²⁴ 《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

子」晉升到「君臣」的可能。在日本，不少武家典籍中，也幾乎是「忠孝」並存，成為武人必須遵守的經典訓示。²⁵

作為日治初期頻繁出現於漢文報刊上的劍客小說，也延續了這個傳統觀念，雖然一開始在形構小說主角時，皆是以「孝」設定他們的人格特質，但隨著情節的開展，也將漸漸地將他們由「孝」入「忠」，成為忠孝兼備的表徵。

然則，要進入到忠孝兼備的理想人格，「忠」在劍客小說中的影響，不是只有教條式的訓勉，而是代表了對於父子衝突的調和，以及劍客在「孝」以外，更欲追求的崇高理想。

前述〈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就以「忠」化角父子間的衝突，並使菅谷半之丞因主君的訓勉，放棄以死成全「父子」關係與個人名譽完美的抉擇；改以選擇「生」為君盡忠，將生命托付於更高的理想：

內藏良之助良雄歎曰：「余不意於此救子，雖然，子行似可憫，而其志甚愚，一朝憤怒忘身，皆愚夫婦之所為，子不思身為國家之身，非以丞個人之身，子食君主祿，當思效力圖報，今子不出此，乃欲以一死竭已，非從容就義也。」良雄諄諄訓諭，之丞惟叩頭墜淚，自認不是。²⁶

能讓半之丞打消「因父而死」的解決辦法，是使其了解生命應當求更高的目標，此目標即半之丞身為人臣，應將性命留予「為君盡忠」才是大義所在。作為人臣，他的性命雖是父親所賦予，更大的企求，則是為國為君而圖報，才是洗刷冤屈或在歷史上留下美名的良方。但，如何在為君盡忠的不死前提下，化解未因孝而亡的問題呢？在主君的命令下選擇流亡，是盡忠又全孝的折衷方式，也是成就英雄試煉之路

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18。

²⁵ 可參考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東京都：岩波書店，1974年）。

²⁶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4日。

的開啟：

長友復問之丞：「汝果犯不孝之罪乎？」之丞唯唯，長友又問，之丞又唯唯，長友歎曰：「嗚呼，是真余之近侍，盛世之孝子也。凡論人善惡，須一視其平生，今汝不運又不欲闡明父非，據余見，觀汝父書意，分明欲誅責汝不孝。汝其乘更 deeper 靜，潛蹤出國，一可免汝父叱責，一可全汝菅谷家名譽。」之丞又叩頭諭，長友又自內取黃金一錠，命之丞收起，沿途作盤費。是時之丞珠淚落如驟雨，再拜依稀，不忍遽別，謂：「主君能為之丞計畫如此，之丞當生生世世為犬馬圖報。望主君玉體珍重，玉體珍重。」復再拜辭出門。²⁷

以主君之命為菅谷半之丞找到免死的理由，又兼顧孝道與名譽，這一切皆是因盡「君臣」本分的「忠」所賜與的。半之丞的「孝」與「罪」，或是「父子」倫常得以保存，也都指向「君臣」之道的指導。而身為臣子對主君所賜予的「恩」，或是對主君應有的「忠」，則在最後為君報仇、為君切腹的「死」達到小說的最高潮。武士的性命，因要盡忠而沒有浪費在為父盡孝的自盡中，卻因對主君的報答與盡家臣的責任，而慷慨就義。對比殺父仇人絹子與須藤數馬最後雖遭天譴，卻非半之丞為達盡孝而親手復仇的報應，「君臣」之義顯然比「父子」之情更為重要。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由日人溪洲牛郎（?-?）引介進入臺灣的小說〈兄弟復父讐〉，則表現「君臣」與「父子」間另一面向的衝突與矛盾，但最後仍必須以對主公的「忠」為事件的收尾。此篇小說取材自日本歷史上著名復仇事件「曾我兄弟復仇事件」，小說中的主角兩兄弟「一萬」及「宮王」為報父仇忍隱多年，靜待復仇的時機到來，這是他們作為人子為父盡孝的一面：

²⁷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7日。

筓王曰：「欲復父讐，何以弓為？」自執木刀斫之。又一萬嘗仰見蜚雁，嘆曰：「禽獸猶有父母，而能使我孤苦者誰乎？」筓王曰：「讐人之首豈堅于鐵石耶？」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言必有禍。」因相對號泣，焦思苦慮，復讐之念，未嘗一日忘。²⁸

但，兩兄弟不但要面對為父復仇的艱困任務，還要面對「君臣」之道的挑戰。其原因乃是父親與掌握天下的源賴朝間本就有仇，但源賴潮對兄弟兩人而言，是位於君主的地位，加上殺父仇人工藤祐經仕於源賴朝，兄弟兩人不但要挑戰自我的「君臣」問題，也要面對來自源賴潮與工藤佑經所建構的「君臣」勢力：

會源賴朝滅平氏，掌握天下兵馬。祐經仕之，頗受親信。賴朝素與祐親有讐，祐經乘間勸殺祐泰之遺孤。²⁹

兄弟兩人雖然幸運逃過一死，且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最終得以報仇。但，擅殺的後果，造就兄弟兩免不了因「君臣」的主從身分，而須由源賴朝判定其生或死：

翌日，賴朝坐幕中，令狩野宗茂、新開實光，詰其殺祐經之故。時致瞋目叱二人曰：「自我祖父沒後，子孫雖沈淪，不得親近，何就汝輩對狀耶願面謁一言而死。」賴朝壯其言，親詢之。時致曰：「祐成時致，自垂髫至今日，復讐之念未嘗須臾忘之。今志願畢矣，至犯幕府，則一賜謁，將自殺也。」³⁰

雖然兩人慷慨就死，不願苟活。臨終之前的一段話，卻深刻點出「君臣」與「父子」倫常所產生的強烈衝突：

²⁸ 溪洲牛郎：〈兄弟復父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6年6月6日。

²⁹ 溪洲牛郎：〈兄弟復父讐〉。

³⁰ 溪洲牛郎：〈兄弟復父讐〉。

夫祐經，我之讐君之寵臣也，寂心入道。（伊東祐親）君之讐我之祖父也。君寵吾讐，而讐吾祖，能無憾乎？³¹

雖說對源賴朝等人懷有深仇大恨，但因天下大勢握於源氏之手，無法逃離唯君命是從的宿命。為了化解「君臣」、「父子」間累積下來的仇恨，或是處理「君臣」和「父子」間的相抵觸的衝突，兩兄弟必須以「死」作為最終解決之道。通篇小說著眼於對主角兄弟二人的刻畫，著重於為「子」和為「臣」的關係，代表「兄弟」情感的「悌」都在「父」與「君」的主導下被沖淡，可見「君臣」或「父子」在劍客小說中的重要性。

也有的小說雖安排「君」與「父」對立的情節，但始作俑者並非必須盡忠的主君，而是另有反派角色必須透過「復仇」方式去處理，原本看似「君臣」與「父子」間的對立關係可以順勢消弭。〈雌雄劍〉描述父子三人同事一君：

其時諸侯之中，有奧州會津城主蒲生飛驒守秀行者，夙藏傳家寶劍雄龍丸一口以為之配。聞清包名，乃遣人致雄龍丸，屬為精製所謂要配合之雌龍丸者。……乃慎重擇日，遣其兩子——長者名角太郎，次者名綱五郎——攜雄、雌兩口寶劍到江戶大川端繳命。臨發之前一日，戒之曰：「劍由而弟捧持，兄則為其保護，路中千萬謹慎，不可有失。」³²

但反派角色角太郎人受仇敵教唆，將寶劍掉包陷害主角綱五郎外，亦連累養父安井四郎清包被主君處死。綱五郎集人臣、人子於一身，又要面對曾為手足背叛的考驗。但，父親雖是被主君處死，綱五郎卻未在角五郎外牽怒主君，而僅將捉拿角五郎視為洗刷冤屈、重振家門的主要目標。對綱五郎和其父親而言，他們身為臣子，君要臣死，臣不

³¹ 溪洲牛郎：〈兄弟復父讐〉。

³² 潤：〈雌雄劍〉，《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1年6月13日。

得不死外，主因還是角五郎為害在先，故未對主君處死父親一事多有追究，反將為父報仇之事視為對主君盡忠的方式；至於手足相殘、有違「兄弟」之倫的部分，又因兩人沒有真正的血緣關係，顯得無足輕重了。同篇小說中的配角之一村上大助，也具備為臣、為子的雙重身分。綱五郎和村上大助要面對的共同問題，是如何為父復仇；不同的是，有被緝捕風險的綱五郎必須以戴罪之身，在主君前為洗刷自己的冤屈而努力；村上大助則是在主君的支持下、名正言順地將父仇置於為主盡忠的條件下，踏上復仇之路。

由上述例子可見，劍客小說中的主角，乃至於配角，皆是兼具「子」與「臣」雙重身分的劍客，在「父」與「君」間的權力產生糾葛後，劍客最終仍需遵循「臣道」，但此「臣道」並非對天皇，而是在武家政治下，對將軍盡忠的「臣道」。雖然每篇小說的開端與路線，幾乎都是依循劍客具有「孝」的特點加以建構，證明「孝」是重要的美德，也是劍客養成的必要條件，卻也是為了這些劍客走向忠君之道的安排。主角在行孝之時，往往要受到為主君盡忠的牽引，進而引發小說情節持續發展的火花，此種矛盾加諸於小說主角身上，成為他們在面對「君」或「父」時的痛苦與掙扎，卻也因此形構出劍客人格上「忍」的精神，為其成就盡忠大業的根基。

四、「忠孝」觀的轉變：

由「忠優於孝」到「忠孝一本」

對上述劍客小說進行析論後，可以發現，大多小說的敘寫模式，幾乎都是先以主角「孝」的刻畫開始，而又以「父子」間的孝為主。隨著情節的發展，為盡「父子」之「孝」，則衍生出遵從父命，或是父子衝突的兩種情節發展路線，以開啟試煉劍客的修行之路。但，與「君臣」在情節中的抉擇，往往較近於「孝」從屬於「忠」的思考，

揭示的是忠孝既然無法兩全、為君盡忠仍是劍客第一要務。

但日治臺灣並非只有劍客小說所傳達出「忠優於孝」的觀念，在許多宣揚「忠孝」觀的文章中，「忠孝一本」的觀念，在殖民統治趨於穩定後，有取代「忠優於孝」的觀點，表達出「忠孝」觀在日治臺灣的變革，日治臺灣因此有「忠優於孝」與「忠孝一本」兩者觀念並存的特點。例如松平樂翁（1758-1829）〈忠孝〉一文說：

孝於親者，為報俾吾身成人之德，視山猶高視海猶深；忠於君者，因吾人及吾親吾子孫得以生存於世者乃君上之大德。是論□□精到。竭忠盡孝。非為報也。夫深山之梅花自無不香。幽谷之黃鳥亦無不啼。為人子當孝，為人臣當忠。亦猶是也。³³

或是轉引日本大儒藤田東湖（1806-1855）極力鼓吹的「忠孝一本」論，透過孔子之言或是中國傳統典籍的例證，以建立殖民地人民「忠孝不可分」的觀點：

昔孔子之教會參也，曰：「人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一言孝而忠則寓其中，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也。」曰：「孝德以知逆惡，一舉德而眾□判。」由是觀之，忠孝之非二者亦明矣。聖人既歿，大道不明，以衛輒之無父，而傳《春秋》者，或以議許之。以伍員之無君，而編《史記》者，或以「烈丈夫」稱之。後儒又或以為忠於國不可廢、孝於家不可廢。孝既有經，而忠則猶缺。乃述仲尼之意，以作「忠經」。夫以子拒父、構兵爭國，或屠父母之邦、鞭舊君之屍無道殘忍已甚，而不特免不孝、不忠之名。其且列賢君烈士之科，何以使後世有所勸懲？至於「忠經」之作，則不曉忠孝之一本，漫擬《聖

³³ 松平樂翁，即江戶著名政治人物松平定信（まつだいら さだのぶ）的別名。松平樂翁：〈忠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1年5月4日。

經》，添蛇足耳。此皆所謂經師良史，而其謬妄猶有如是者，其弊遂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說。³⁴

之後，隨著殖民統治勢力的穩固，殖民政府開始不停地建立「忠孝為日本固有國體精神」的觀念，期盼殖民地臺灣人民能受到感召。〈皇室及皇族略譜 萬世一系天壤無窮〉引大儒吉田松陰（1830-1859）之語稱：

聖天子戴冠式，即昭和一代之盛典。……環誦吉田松陰先生：「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以本邦為然。」之言，真是式金式玉、千古不易。³⁵

吉田松陰是日本幕末時期懷有強烈「倒幕尊皇」意識的學者，張崑將認為，其意識已明白彰顯對天皇盡忠即是繼承父志，也影響明治維新後發展出以天皇為日本子民大家長的觀念，形塑出日本獨有的「一元性」現象，而非中國的「二元性」。³⁶日治臺灣開始接受到吉田松陰的論點，代表臺灣除幕府時期「忠優於孝」的觀點透過小說而存在外，亦受到19世紀江戶幕府末期日本建國思潮復興的影響。³⁷〈忠孝與思想問題〉一文，也開宗明義地闡揚「忠孝為日本國體精神」、「忠孝本源」的「忠孝一本」論，認為為君王為父母，皆應以追求「忠孝並重」為目標。為何「忠孝」可以視為一本同源呢？文章接著由日本家族制到政體制的論述出發，以印證此觀點在日本的落實：

³⁴ 藤田東湖：〈忠孝一本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11年6月17日。

³⁵ 佚名：〈皇室及皇族略譜 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8年11月19日。

³⁶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274。

³⁷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頁230。

發揮忠孝，擁護國體者，家族制度也。……日本之家，由戶主統率一家族，子子孫孫、綿延不替，故家非只現在夫婦一代，以繼承先祖之家督為中心，乃成一家。³⁸

我國之家族制度，係總合家族制度，國家既為一大宗族之體系，此體系之大家長，乃萬世一系之天皇陛下。……古來家族制度，多以孝為道德實踐之基。然個別家族制度之間，不知忠孝一本之道，國家全體有不為大家族，則於父母盡孝養之道，亦只孝而已無所謂忠也。殊如君主屢易之國，繼祖宗之遺志者反為不忠之臣，無總合家族制度之國，忠孝全為別義，故只有個別家族制度之國，專重於孝，略輕視乎忠也。³⁹

文中批評屢換君主之國，明顯地認為中國國體不如日本國體。文中頗自豪於日本「萬世一系」的精神，指出日本家族與國體的緊密相連，才能將「忠孝」兩者全面結合與發揮。小山朝丸(?-?)的〈忠孝一途解〉也說：

我國者，肇國之初，已有皇室，而後人民生，故皇室是人民之宗家，人民是皇室之末家。所以君臣相倚相扶，以致今日連進運，無他焉。則忠孝一途，亦實存乎此。夫忠孝不可偏廢，而孝在乎忠之間，在漢土，先有人民，而後王者現，故忠孝自有別，而孝重矣。……今也島民濟浴皇恩，故重國憲、遵國法，修身習業。率眾興產，以盡臣子之道，則聖恩無窮、家道繁榮、不可得望，是所以忠則孝自至也。故誘島民之子弟，以此心，則庶幾乎教忠孝一途而無大過。⁴⁰

³⁸ 佚名：〈忠孝與思想問題（三）〉，《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月30日。

³⁹ 佚名：〈忠孝與思想問題（四）〉，《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2月1日。

⁴⁰ 小山朝丸：〈忠孝一途解〉，《臺灣教育》第195期，1918年9月1日。

認為中國是「先孝後忠」，強調的是「先家庭後國家」。而今日，臺灣既然已經領受到日本天皇皇恩，就應以報君恩為首要之事。且皇室為人民的宗家，盡忠也是行孝，兩者不相違背。〈忠孝不二論〉則寄望殖民地臺人效法「忠孝」為名譽的精神，在忠孝間求得兩全：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是也。」人生得忠孝之名稱于世，斯永垂諸不朽矣。……孝者，所以事君也。……朝廷之所期諸民者，曰：「爾為宰輔，當靖共爾位，以盡厥職。爾為黎庶，當和顏悅色順親之心，若是者為家庭之孝子，即為國家守法之良民，斯即孝即忠矣！而何必居官盡職始克謂之為忠乎？父兮鞠我、母兮育我，無論何人又允宜各自孝其父母也。」願孝亦願不易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亦既側身朝右又烏得不忘家報國而鞠躬盡瘁以仰慰宸衷乎？……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蓋尤必入而無愧親心，始可出而克昭臣節，否則門庭或有虧子道則是已忘木本水源之誼，一旦風雲釋褐將不免薰心利欲而唯利是圖，親恩可負欲其無負君恩。蓋已難矣，不能孝詎能忠，此忠與孝，實有相因者也，而烏能分為二致乎，第自富貴逼人貧賤之子或至雖孝弗傳而仕宦之忠于國家者，則有祠宇崇宏輝煌金碧庸俗者流，或即疑忠孝之顯判低昂矣，不知仕宦而至將相苟未能盡心為國即求為孝者執鞭，且有不可得者而能比肩而立乎？故孝者忠之原也，忠者孝之發也。常人能孝親而更得軒冕之榮，俾勞于王事忠孝，固實能兼全，若能孝親而終守田園之樂，藉得常侍庭幃忠孝，亦自可以並稱，孰謂二者不可得而兼哉，作忠孝不二論以發明之臺民，勿以淺近忽之也。⁴¹

在論者的觀點中，認為「忠」與「孝」是不可分的，從文中可觀察論者欲塑造「忠孝」作為臺人立身準則的目標，當然也隱含日本天皇制

⁴¹ 佚名：〈忠孝不二論〉，《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02年9月10日。

的頌揚與稱讚。在以天皇為唯一政治信念的規範下，自然將結論導向：「孝者忠之原也，忠者孝之發也」的「忠孝一本」論了。

以時間觀察，偏向闡述「忠優於孝」的劍客小說，刊登在報刊上的時間較集中在1920年以前；而談「忠孝一本」的文章，則自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即不時地出現在報刊中；⁴²就數量而言，宣揚「忠孝一本」的文章，也多過講述「忠優於孝」的小說。但無論是何者對「忠孝」觀的思維取向，都彰顯隨著殖民統治的日益深化，被殖民的臺人，也逐步表現出更深刻、且較符合時代潮流和國家政策的「忠孝」體認。同時，劍客小說被轉載的時間點，與幾篇著名日本漢文小說被轉載進入臺灣的時間點相去不遠，可歸因於統治初期大量日本儒官在日本國內政壇失意、轉而到初被統治的殖民地臺灣求發展有關。這些深受德川幕府時代影響下的儒官，正是因日本「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下的失意者。⁴³他們不但為殖民地臺灣帶來他們的漢學學養，也帶來漢文小說與對幕府將軍必須盡忠的觀點，終使得這些被轉載入臺灣的劍客小說，雖然被描述成努力追求「盡忠」與「全孝」的模範，卻是充滿著「藩侯意識」與「幕府意識」，「萬世一系」的天皇反不見於這些劍客小說中。例如上述「曾我兄弟復仇事件」所改編成的〈兄弟復父讐〉，或是「赤穗四十七義士」的相關小說等，由歷史事件演變成劍客小說，都是因其「忠孝」特點為後世所傳頌與效法，成為宣揚日本「忠孝」精神時不可缺的教材。或如〈原惣右衛門元辰〉一文，力讚原惣右衛門元辰既是孝順母親的人物，卻又為了盡主君之忠而甘願復仇並犧牲性命。⁴⁴〈塚原左門〉中主角塚原左門對

⁴² 雖然有例外，例如〈雌雄劍〉在1921年，但其他篇的刊登都較集中。

⁴³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下村作次郎、吳密察等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年），頁111-113。

⁴⁴ 佚名：〈原惣右衛門元辰〉，《立政教報》第11號，1933年2月1日。當然，這裡面也涉及到「士為知己者死」的武士道精神。可參考林以衡：〈跨界的和魂：〈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通俗小說對「武士道」的引介與再現〉，頁271-308。

平三郎的訓誡，也表現武士應做到「忠孝並進」的目標：

平三郎之父平太夫聞報，亦降階迎接，曰：「豚子年少無知、好行兇鬥狠，有多冒瀆，伏乞赦免，並為教訓一番。」左門清則曰：「然，非令郎之惡，由令郎弟子瑕疵參半也。夫即稱為武士，則當慎守武士清規，為國盡忠，居家致孝，方不失為天地間有用材器。今汝眾能守余之教訓，余則暫留此，不則余去也。」⁴⁵

不過，他們盡忠的對象，都不是天皇，而是幕府將軍或藩主。張崑將說：

日本的「士」皆為「武士」，也沒有中國的科舉和全國規模的官僚組織，一般武士唯知「藩侯意識」或「幕府意識」，不知有「全國意識」，因為德川三百藩的封建制中，各藩就是各一小國，所以都懷有強烈的地方藩國意識，欠缺有全國的日本意識，導致各藩之武士欠缺統合的全國意識。⁴⁶

臺灣文人如何面對這個矛盾的現象？作為小說的引介者、閱讀者，以及殖民文化的接受者，臺灣文人必會留意到這個弔詭的現象，這與過去臺灣在接受清廷統治時，只對天子效忠的情況是不同的。但在震撼日本擊敗中國的實力、魅於其文化的力量之餘，到底盡忠的對象是藩主、幕府或是天皇？隨著殖民統治的更穩固，以致於太平洋戰爭、皇民化運動達到極致，這個問題其實自然地就會有眾多鼓吹軍國主義的文章去解決。畢竟，日治初始，被殖民者並非立即就能了解「忠孝」問題在日本精神史上各學派的歧異性，作為文化的接受者，

⁴⁵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1年1月30日。

⁴⁶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頁245。

往往受到周遭日本儒官的影響，或是對新到來文化的奇異感，匆匆將其引入臺灣，而少去深思此矛盾議題。且以時序觀之，幕末以降，對日本國體「忠孝一本」的主流解釋，早就隨著時間發酵而蓬勃發展，日治初期劍客小說中「為主盡忠」對象非「天皇」的矛盾，也只是「藩侯意識」的迴光返照，終將為日後興盛而起的皇民思維、軍國主義取而代之。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初期臺人初識日本國體精神後所擔心的，也存在著不是對誰盡忠的思考。魏清德（1887-1964）在翻譯完〈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後的譯者評論，值得注意：

異史氏曰：「日本國以忠訓世，而支那以孝示天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孝而不忠者也。讀赤穗四十七義復仇之快舉，益知我國忠義之由來，然而未嘗有一不孝者，如菅谷半之丞，亦大孝之人也。我臺灣隸版圖未久，『忠』字之觀念未生，『孝』字之印象已沒，牛鬼蛇神，汨沈道德，不可慨乎！」⁴⁷

作為文學翻譯者、文化接受者和思維評論者多重身分的殖民地文人魏清德，⁴⁸讓他感到困擾的，並非是「盡忠對象為何者」的問題，而是以小說為鑑，憂心臺地「忠」、「孝」不彰，故翻譯此小說，期盼臺人能引為榜樣、學習殖民母國的「忠孝」精神。他所注意的重點，不是天皇／幕府、幕府／藩侯的位階問題，反是顯露殖民高等文化與被殖民次等文化的思考，而致力以小說宣揚臺灣也應趕緊建立如

⁴⁷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廿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8月11日。

⁴⁸ 魏清德對「忠孝」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因為上述多篇小說，大多是魏清德以其筆名如「雲」、「異史」、「潤」、「雲林生」等翻譯而成，可見魏氏對於日本「劍客小說」的喜愛、對「忠孝」議題的感觸頗深。翻譯這些小說，故然也有對殖民者示好的成分在，卻也表現出魏氏對臺灣現況的留意與檢討。有關魏清德筆名的考證，可參考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頁38-39。

日本般的「忠孝」美德。魏氏如此思考，那麼日治初期和魏清德相同、開始在文壇報業上嶄露頭角的知識群體彼此思路相近的話，他們的重點也如同魏氏，僅是企圖培養殖民地臺灣「忠孝」精神的養成，對象是誰，也就不會是最急切的問題了。

魏清德之外，被視為與日本殖民者較接近的謝雪漁（1871-1953），則由不同的觀點看「忠孝」問題。他將「五倫」的實踐視為文明化的進程，故實踐「五倫」、發展寄寓其中的「忠孝」，是促使臺灣能夠朝文明邁進的動力：

文明之境界，又分而為二：「有精神的文明焉，有物質的文明焉。」精神的文明者何？無形之文明、道德上之文明是也。物質的文明者何？有形之文明、技術上之文明是也。在道德上之文明，上世無君臣倫理，無所謂忠敬者；無父子倫理，無所謂孝慈者。無兄弟倫理，無所謂友愛者；無夫婦倫理，無所謂靜好者；無朋友倫理，無所謂信義者。迨中世五倫之道明，而個人之資格完全，至近世又推此私德，以為公德。不獨對一家族、對一社會，即對一國，並對於異國，無不本此心也。⁴⁹

如果說魏清德是由緬懷傳統道德的失落感出發，而對殖民地臺灣提倡學習殖民者的「忠孝」以達成臺灣社會風氣的變革。那麼謝雪漁則是趁著臺灣在時代變革、追求「文明」的風潮下，將傳統觀點如「五倫」、「忠孝」等附加在「文明」的詮釋中，宣揚追求「文明」與維護傳統的「五倫」觀、發揚「忠孝」、「孝慈」、「信義」與「友愛」等，不但不相違背，反而是相輔相成，故臺灣人民可以放心去追求「文明」，而不會陷入傳統與變革中的泥淖。

魏、謝兩人的共同點都是站在殖民者的角度，盼以「忠孝」、「孝慈」等觀點達成改革臺灣社會風氣的目的，但謝雪漁將「五倫」

⁴⁹ 謝雪漁：〈說文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05年10月28日。

及其所衍生出的傳統觀念套入時下最被世人所關心的「文明」議題，顯然又更高明。但也反映出被殖民地人民在接受殖民文化的洗禮時，統治者是如何藉由對「文明」的追求、調和傳統觀點等方式，以達成其殖民統治臺灣的思想灌輸，促使臺灣逐步以殖民母國為學習的榜樣。

但，愈到殖民統治後期，強調「忠孝一本」的目標就愈來愈明確了。透過如人物典範的建構，讓殖民地民眾對「忠孝一本」實踐有效法的對象，且這些盡「忠孝」的對象，都必須是「萬世一系」的天皇，才值得為世人所學習和歌頌。例如伊澤修二（1851-1917）就將日本陸軍大將、於日俄戰爭中間名後擔任臺灣第三任總督的乃木希典（1849-1912），視為「忠孝雙全」的代表人物。以此美譽加諸其身，伊澤修二欲證明乃木希典其人格精神與國家國體的結合，是成為國家偉人的典範：

乃木大將之忠誠，世人莫不知之，而鮮有道及其孝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家，我國民倫理道德，必忠孝一致而始可。世人之稱頌大將，評論大將者，其孝往往為忠所掩，未嘗論及，吾人憾之。⁵⁰

伊澤修二撰此文的目的，是為了祭悼兩個月前才因明治天皇（1852-1912）過世而與妻子雙雙自盡殉葬的乃木希典，⁵¹其「忠」為人所感佩，自是為天皇殉葬一事。但「忠」與「孝」要兩全，就不得不對乃木將軍的「孝」加以歌頌，才能在文末時高呼：「嗚呼！大將偉人

⁵⁰ 伊澤修二：〈忠孝一致乃木大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2年11月2日。

⁵¹ 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陸軍大將、日本領臺後第三任臺灣總督，生平歷經討幕、戊辰、西南、甲午等戰爭，最為人知的是日俄戰爭時，兩個兒子皆為國犧牲。對天皇有濃厚的忠誠意識，故明治天皇駕崩後，乃木希典與其夫人一起自殺為天皇殉葬，成為日本人崇敬對象。乃木希典生平可參考松下芳男：《乃木希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年）。

也！忠孝無雙之偉人也」。⁵²除了距離當下臺人不遠的乃木希典外，歷史人物如對天皇盡忠的楠木正成父子（楠木正成，1294-1336、楠木正行，?-1348）、守護日本「萬世一系」有功的和氣清麻呂（或作「磨」）呂，都是被歌頌的對象：⁵³

國家將在滅亡或艱困之時，都會出現忠臣孝子。……例如講君臣分別的和氣清麻呂、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楠公父子、奏呈《出師表》的諸葛亮、作《正氣歌》表示至忠的文天祥……；⁵⁴以死勸諫無道老父的小松內府、為尋老父而溺死的曹娥、無論和漢，有此例的皆不少。⁵⁵

又說：

社稷的安全有忠臣即能維持；家庭的平和有孝子即能保全。……「忠孝」就宛如星光般，國家有事時盡忠有孝，就有如黑暗中的星光般各個清晰能為眾人所睹；國家太平時，盡忠有孝則如同白天的星光沒人能知曉。⁵⁶

⁵² 伊澤修二：〈忠孝一致乃木大將〉。

⁵³ 細川醉夢：〈忠孝論〉，《語苑》第20卷8期（1927年8月），頁57-62。《語苑》為當時教授日本人臺灣話的教材刊物，故此篇文章是以日文和假名拼音的臺灣話文對照而成，此處以中文譯文呈現，筆者自譯。

⁵⁴ 和氣清麻呂，受僧人道鏡的迫害而被流放到鹿兒島，並被改名作為處罰，但卻自始自終擁護天皇一脈，最後更肩負建造平安京（今京都）的重任，京都有護王神社即是祭祀他。和氣清麻呂和楠正成在日本史上因具對天皇絕對的忠誠，故具有崇高地位。新村出編：《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頁2573。

⁵⁵ 小松內府，即平重盛。平重盛為平安末期權臣平清盛的嫡長子，因其妻子是後白河法皇重臣的妻子，故當平清盛與皇室有衝突時，平重盛往往為了維護皇權而擔任協調者的角色。在《平家物語》中，平重盛的形象正面，被其父讚曰：「重盛可謂寬大厚道之人。」又在物語中被稱：「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於君於忠，於父則孝。重盛之所為乃不違文宣王之教。」因其住在六波羅小松第，所以又被稱為小松公、小松內大臣。可參考鄭清茂譯注：《平家物語（上）》（臺北：洪範書店，2017年），頁52-154。

⁵⁶ 細川醉夢：〈忠孝論〉，頁59。

盡忠盡孝為天皇、為國家等信念愈明顯出現，標幟臺灣在日本多年的殖民統治下，將逐步地被納入日本國體的範疇。也代表殖民地臺灣正被日本國內高漲的軍國主義牽著走。米南（?-?）〈國體の眞義〉代表了這個風潮，尤其它與軍縮會議宣告破裂的新聞放置於同一版面時，⁵⁷更強化了當下思維：

我日本，為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其他諸國，有以「德」為中心、有以「力」為中心、有以「自由」為中心，或如西歐諸國有以「法律」為中心……。 「天皇」為我國之國體，又同時為全體。……天皇即國家、國家即天皇。……「國」與「家」不二體也，「家國一致」與「忠孝一體」並有也。⁵⁸

作者甚至在文末有「我日本之國體為世界萬國之卓絕、全地球無有可比擬」的自豪言語，其狂誕口氣與不可一世的態度，正是在日本即將對華開戰前夕、那股國家至上思想高漲的時代所表現的特點。又或是〈日本為忠孝一如〉：

我國家族制度發達，依此為基出來忠等於孝、孝亦為忠，此即「忠孝一如」。日本國的統治者天皇陛下，義如君臣；情如父子，故臣民為陛下之赤子，作為絕對尊崇與信賴者。⁵⁹

文末並強調對中國發動戰爭乃是義舉之事，為的是確保東洋和平的確立。至此，奠基於「父子」、「君臣」的「忠孝」觀已無可避免地被歸結到對天皇盡忠、為國付出的軍國思想之中，日本國體觀在殖民地臺灣的建立，也已確立了宣揚的道路，不再像是日治初期那樣還有不同的想法出現，顯示因為戰火正熾以及統治穩固的關係，殖民地臺灣

⁵⁷ 橫山市治：〈軍縮會議決裂せば〉，《法政公論》第9期（1935年4月1日），頁3。

⁵⁸ 米南：〈日本國體の眞義〉，《法政公論》第9期（1935年4月1日），頁2-3。

⁵⁹ 佚名：〈日本忠孝一如〉，《まこと》第1版，1938年6月1日。

的「忠孝」觀終走向「忠孝一本」、「為國服務」的目的了。⁶⁰

五、結論

本文透過對日治初期劍客小說的解讀，由小說中所表現的「五倫」，其中「父子」、「君臣」關係為觀察重點，探討「忠孝」觀念在日治時期的建構與確立。首先，日本劍客小說透過報刊為媒介，為臺灣文人所帶來的創作時的新奇感，或是閱讀時的趣味性、消遣性，這些都便於殖民者可以很容易地將日本式的「忠孝」觀灌浸於殖民地讀者的腦海中，尤以識字階層的知識分子為最。當原本嚴肅、神聖的國體議題轉化成通俗小說時，無疑是吸引被殖民者願意接受新任統治者的文化與思維的最佳利器。帶有濃厚大和風格的劍客小說所要代表的，不僅是日本小說引介進入臺灣，成為被日治臺灣人閱讀、被學習的對象，並為東亞文學流動立下例證。更重要的是，透過劍客小說中對劍客或是其他角色在「忠孝」上為人處世的描述，或是以「忠孝」作為評斷人物品德高下的標準，其實皆是殖民政府意欲將日本國體精神根植於殖民地民眾腦海中的策略。

其次，本文探討這個由「君臣」、「父子」倫理關係擴大而來的「忠孝」觀，卻因其「盡忠」、「盡孝」對象的不同，而產生「忠優於孝」和「忠孝一體」的歧異。這個歧異源於日本國內對國體精神在各時代、各流派的不同思考與爭辯，卻在日本領有臺灣後，再次於日治臺灣的語境中呈現。對於臺人而言，為誰「盡忠」、「盡孝」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如何以「忠孝」充實日治臺灣的社會，並使其向殖民母國看齊，才是當下最欲思考的解決之道。而隨著時間推移與殖民統

⁶⁰ 此種由孝到忠、忠孝一本的變化，也可以由由私到公的方向加以思考，例如溝口雄三著，陳光興、孫歌等譯：《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0年）；陳弱水：《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2020年）。未來將在另文中深入論之，感謝匿名審查人對參考資料的提供。

治的穩固，日本欲對殖民地人民進行國體精神灌輸的「忠孝」觀，又將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下達到高峰，並確立對「萬世一系」天皇的盡忠目標，這實是將臺人化約為真正皇民的前奏。

最後，透過本文的分析，可見無論是倫常觀念、忠孝觀念等，或是其他本文尚未討論、留待日後將繼續深究的如武士道、武運觀等，儒教思想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到底日本儒教觀對殖民地臺灣的影響如何，是本研究日後能再論述的方向。如此，日治臺灣文學或思想的研究才能在未來東亞漢學或儒學的研究中提升其重要性，這將會是研究者們日後得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徵引書目

- 下村作次郎、吳密察等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年。
- 小山朝丸：〈忠孝一途解〉，《臺灣教育》第195期，1918年9月1日。
-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編：《中華百科全書》第6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2年。
- 王俐茹：《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
- 伊澤修二：〈忠孝一致乃木大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2年11月2日。
- 米南：〈日本國體の眞義〉，《法政公論》第9期，1935年4月1日。
- 佚名：〈日本忠孝一如〉，《まこと》第1版，1938年6月1日。
- 佚名：〈忠孝不二論〉，《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02年9月10日。
- 佚名：〈忠孝與思想問題（三）〉，《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月30日。
- 佚名：〈忠孝與思想問題（四）〉，《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2月1日。
- 佚名：〈皇室及皇族略譜 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8年11月19日。
- 佚名：〈原惣右衛門元辰〉，《立政教報》第11號，1933年2月1日。
-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5·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431。
-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8·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98。
-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8·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108。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18。
-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 松下芳男：《乃木希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年。
- 松平樂翁：〈忠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1年5月4日。
-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1月28日。
-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1年1月30日。
- 松林伯痴講，雲林生譯：〈塚原左門（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2月20日。
-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頁149-186。
- 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19年。
- 林以衡：〈跨界的和魂：《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通俗小說對「武士道」的引介與再現〉，《成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3月，頁271-308。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政治重要術語的形成》，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柯混瀚：《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源——以文言小說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4年。
- 茂呂美耶：《物語日本：劍客生活忍者昔人歲時》，臺北：遠流，2002年。
- 陳弱水：《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2020年。
- 細川醉夢：〈忠孝論〉，《語苑》第20卷8期，1927年8月15日，頁57-62。
-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
- 森川哲郎：《室町——明治劍豪列傳·日本劍豪·名勝負100》，東京：日本文藝社，1980年。
- 雲：〈寶藏院名鎗（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1年6月16日。
- 雲：〈塚原卜傳（一）〉，《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2年1月7日。
-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縣：立緒文化，1990年。
-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年，頁237-283。
-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63-396。
- 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
- 新村出編：《広辞苑》，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
- 溪洲牛郎：〈兄弟復父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6年6月6日。

-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李文彬譯：
《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志文出版社，
1973年。
-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下村作次郎、吳
密察等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
2000年，頁110-120。
- 溝口雄三著，陳光興、孫歌等譯：《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
的思想方法》，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0年。
- 潤：〈雌雄劍〉，《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1年6月13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一）〉，《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第7版，1910年5月29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四）〉，《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0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五）〉，《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第7版，1910年6月12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六）〉，《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4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七）〉，《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6月17日。
-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廿四）〉，《漢文
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8月11日。
- 鄭清茂譯注：《平家物語（上）》，臺北：洪範書店，2017年。
- 橫山市治：〈軍縮會議決裂せば〉，《法政公論》第9期，1935年4月
1日。
- 謝雪漁：〈說文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05年10月
28日。
- 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
說》，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

藤田東湖：〈忠孝一本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1年5月11日。

藤田東湖：〈忠孝一本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11年6月17日。